

經濟領域，則意味着國民黨可以運用軍事、政治、思想等超經濟手段干預經濟活動，這可以說是工商界和市黨部頻起紛爭和衝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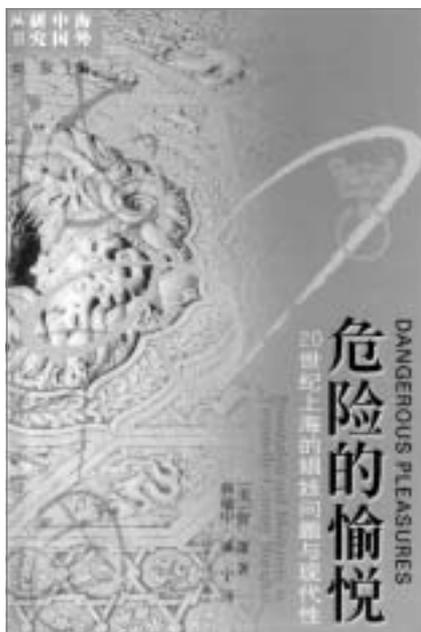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工商界、市政府、市黨部的關係的演變是受多種因素制約的，其實際表現形態是比較複雜的。黨、政府、工商界，如何界

定自己的角色身份，如何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上海城市現代化建設中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安克強教授對三者關係的探討，開創了一個饒有趣味的研究課題，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民國上海社會的認識，同時，對於我們今天建構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也具有借鑑意義。

## 重構綺麗的歷史碎片

● 侯杰、李釗

賀蕭教授所撰的《危險的愉悅》一書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婦女史著作紀念獎，這是歷史學會首次將該獎項授予研究美國以外地區婦女歷史的作品。作者筆下所展現出的妓女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間，與廢娼運動中所描述的受難者形象完全不同；也與二十世紀初出版的「指南書」所描寫的，娼妓是使男人受難的施動者形象有所不同。



賀蕭 (Gail Hershatter) 著，韓敏中、盛寧譯：《危險的愉悅——二十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賀蕭 (Gail Hershatter)，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歷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她所撰寫的《危險的愉悅——二十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一書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婦女史著作紀念獎 (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in Women's History)，這是歷史學會首次將該獎項授予研究美國以外地區婦女歷史的作品。該書漢譯本是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的一部重量級著作，出版後對於大陸學者正在興起的社會性別史的研究熱潮產生積極的影響，隨後也掀起了婦女、媒體、記憶等後現代主題著作的出版熱潮。海內外多位學者，如台灣學者李孝悌，都對此書給予很高評價。

現代性無疑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理論命題，因為中國的現代性是命定的問題（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頁2）。筆者在2002年初聞賀蕭教授撰寫的英文著作名為《娼妓問題與現代性》時，不免有幾分詫異：這樣的切入點如何能介入如此深刻的主題。2004年6月，筆者在上海參加「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有幸得到賀蕭教授《危險的愉悅》的簽名贈書，從而對該書的認識和了解與日俱增。

作者筆下所展現出的妓女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間，與廢娼運動中所描述的受難者形象完全不同；也與二十世紀初出版的「指南書」所描寫的，娼妓是使男人受難的施動者形象有所不同。嫖妓——原本作為男人消遣的對象——同近代中國的上海一樣，為求得暫時的愉悅，不得不警惕種種危險。

所謂「危險」並不僅僅是嫖妓行為本身充滿着違犯法令的危險，而且還藏匿着欺騙——小到丟面子，大到人財兩空。男女之間種種真真假假的關係，有交易、有利用，受害者可能是妓女、嫖客、老鴿中的任何一方。這種危機四伏的境遇，彷彿不僅僅是男人在妓院中所能遇到的境遇，而是周遭的一切都在妓院所提供的特定公開場域中展現出來。

與所有的史料一樣，關於名妓的大量資料有兩種明顯的「製造歷史」之印迹。高等妓女因其具有高度的可觀瞻性，成為社會共享消息的一部分，一連串有趣的秘聞、大

量的細節描寫，意在品評妓女的品性。她們本身塑造着上海的都市生活，成為規訓女性行為的典範。當然，她們也成為男性用以書寫被強加現代性的晚清的原料。作者一方面藉着有關妓女的史料記述了大量時代生活的內容，另一方面將很多注意力引回到「曾注視妓女和記錄她們行為的目光」上。那些對滿腹經綸男性文本製造者——士人——的解讀，成為本書的一大看點。對中國讀者而言，熟悉的故事情節和固定的表達方式本身已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但作者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不禁令讀者發現文本中留有如此之多補苴罅漏的痕迹；也使得妓女對青樓生涯的自身理解，沒有同諷刺性的文本一起消失在關於她們的故事深處。

民國時期，妓女暫時從男人的筆墨中逃離出來，直接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發生了關係。這樣，參與了「抵制外貨」、五四運動、興辦學校的妓女便成為受到威脅的一部分人，而並非僅僅是製造危險的因素了。為了國家的強大和現代化，妓女對自己的生涯和命運也形成了新的認識，她們被列入了改革的目標（頁163）。

當妓女選擇直接以「國民」的身份參與國家改革時，國家也將妓女納入了被改革的範疇之內。她們幾乎失去了區域和正常社會的認同，劃分歸屬的過程讓人發現，監管妓女原來已遠非晚清文人騷客筆下的歎喟、無奈那麼簡單。作者試圖打破民國改造派文人的文字中常見的對惡老鴿和無辜妓女的定型描述，展示了老鴿、妓女多種複雜的角色

民國時期，妓女暫時從男人的筆墨中逃離出來，直接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發生了關係。這樣，參與了「抵制外貨」、五四運動、興辦學校的妓女便成為受到威脅的一部分人，而並非僅僅是製造危險的因素了。但當妓女選擇直接以「國民」的身份參與國家改革時，國家也將妓女納入了被改革的範疇之內。

新中國成立後，將娼妓連同民國政權連根拔起。但新中國的文本製造者也同樣製造了一種幻象語境，頗具目的性地選擇了史料文本。他們取捨文本的標準和製造語境的最終目的，正是強調政府監管的有力。「訴苦」也是國家培養的一種話語形態，讓妓女在接受思想改造時，學會用國家的語境訴說不同的過去，進行群體思考，讓每個人的過去與國家提供的「應該的過去」一致起來。

和身份。小農經濟結構性的瓦解、生活狀況的窘迫不是由她們自己或所謂「道德」能控制、主宰的事，甚至有些人從事性勞動背後有着道德的、令人敬佩的理由——盡孝道。

中華民國建立，傳統的政治體制已成往事，但妓女作為與政治聯繫密切且受到社會高度注意的群體的命運似乎並未改變。社會文人將整套的民主共和國家官員的職位套用於「花榜」上，用以諷刺社會進步的虛偽性。另一方面，民國時期知識份子呼籲可以激勵行政當局改善社會風化，改變經歷了很多毀壞的社會生活狀況，重建國家。在他們的表述中，妓女被塑造造成受挫折的情緒群體，並且是被有意經營和加強了的情緒群體。整個民國時期，在法律話語和改革話語的刻畫下，妓女的受害形象和危害社會形象逐漸成為清晰的群體刻板印象，作者着意濃重的筆墨，是法律的監管目的與社會知識群體的拯救目的——這才是妓女作為矛盾的施害者形象和受害者形象出現的原因。作者更想要呈現出的，是妓女與其他城市居民一樣的生活景象：她們並不是總有罪或有難，但有關她們平常生活的報導，即使是在當時也是篇幅不多，而這些無疑是歷史有意留下的空白。

作者似乎更關心歷史的記錄選擇了甚麼，捨棄了甚麼，更希望讓讀者明白，經過摘選之後的歷史不是真的歷史。但作者認為，這種「取」和「捨」之間處處閃爍着文本製造者的思想火花，當然，在這本書中作者分析火花時的「火花」，使得該書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她嘗試着

呈現一種更為複雜和微妙的女性生活畫面，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娼妓在法律和社會文化生活複雜的結構定位中掙扎、競爭和努力，她們參與了自己身在其中的社會和歷史進程。

作者發現：知識份子賦予娼妓的意義不斷在變化，有時用於探討民族軟弱，但偶爾也將其作為民族現代性的指標符號，認為她們與國家的富強有着很大關聯。「中國」——作為一個男性氣質的存在，虐待自己的婦女。反過來，中國被其他殖民國家蹂躪，「殖民」這個詞本身所帶有的含義，即作為女人似的受到任意的買賣和侮辱。所有比喻中最具戲劇性的無疑是性病與中國衰弱的例證。

隨着歷史進入二十世紀40年代以後，妓女已經不僅僅是危害社會風化和傳染性病的問題群體，而且是民國經濟上通貨膨脹和政治上軟弱無力的標誌。是否取締妓院也從社會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毫不留情地將娼妓連同民國政權連根拔起。但新中國的文本製造者也同樣製造了一種幻象語境，頗具目的性地選擇了史料文本。他們取捨文本的標準和製造語境的最終目的，正是強調政府監管的有力。「訴苦」也是國家培養的一種話語形態，讓妓女在接受思想改造時，學會用國家的語境訴說不同的過去，進行群體思考，讓每個人的過去與國家提供的「應該的過去」一致起來。

在改革者的文字中，社會性別、現代性和國家，三者像一個未解方程中的各項變量，從晚清至民

國結束，各個歷史時期的知識份子都試圖選擇一種巧妙的方法將這個方程解開，求得準確的答案。但無論其手段如何、結果怎樣，社會性別都從屬於各種國家、現代性的政治議題。毛澤東時期，將性和社會性別問題有力地從國族、現代性的方程式裏勾銷了，似乎知識份子再也不須要為現代性苦惱，中國向何處去已經不是疑惑。

作者將內容按照歷史順序敘述，從二十世紀初敘述至二十世紀末。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非但未囿於單線的歷史敘事，反而向讀者充分地展示了一個個完整的「功能塊」。這些功能塊一起構成了一幅立體的社會畫卷。在全書四部分標題中絲毫未提及時間的限制，而用愉悅、危險、干預、對話來概括，可見作者的匠心獨運。這一組詞語背後掩藏着一個近代中國心態史的進程，並明確地標記出這個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晚清、民國、內戰時期、當代中國。事實證明，刻板而機械的分期方式全然不如作者這樣用「愉悅」、「危險」、「干預」、「對話」等高度概括的詞句來得真切和準確。這四個詞語深刻且活生生地闡述了百年間民族國家心理的轉變。或許在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絕不是按時間的順序鋪展開去，這裏面夾藏着太多的反覆、褶皺，把它們扯開、鋪平反而是扭曲了歷史的真實。層疊的就該是層疊地出現在我們面前。像在民國時期滯留的愉悅何妨讓它屬於晚清的心態，亦如危險已然顯現在晚清的上海，何必徒然用轉折、段點來劃清。這不得不讚嘆作者的卓然生花之思。

闔書冥思，作者打破線形的歷史描繪，希圖建立起一個立體的歷史結構。在建構的同時，作者還在拼命地解構歷史的真實。正如作者所講述的那樣，書寫歷史的過程就是在剝洋葱。如果歷史學者專心致志一層一層地剝開洋葱，去尋找想像中的本質內核的話，那麼他會發現除了剝下來的一堆東西和刺痛的雙眼外，甚麼也沒有找到。歷史文本的寫作或許並不代表歷史的真實，這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給予讀者的一種關於歷史的認識方式。或許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弔詭，讓人覺得頗具諷刺意味。把故事撕破了給人看，這本身就需要膽量和勇氣去直面一切，當然，還要有揭穿事實真相的能力。在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理論指引下的中國史學存在着理論泛濫和史實空洞的隱性問題，作者卻用厚實的歷史敘述，為「何謂解讀，何謂解構」歷史文本樹立了典範。

全書貫穿着文獻和分析文獻的兩個線索，同時塑造了妓女作為不道德代表和不道德受害者的雙重歷史形象。用作者的話來說：「我們無法在注視『事實』和注視『事實』的生產過程中劃出一道截然的界線。」（頁342）在這句話背後，也隱含着作者掌握足夠史料的學術功力，具有足夠的學術素養。在纖芥不遺的爬梳工夫以外，如果沒有一份成竹在胸的信心，我們想任何史學家不敢輕易在討論一段歷史時期時，對一段歷史的敘述方式和敘述語言如此剖白。

二十世紀作為中國變動最頻繁的歷史時期，作者選擇「上海娼妓問題」這樣一個切入點，進行了一番

作者說，書寫歷史的過程就是在剝洋葱。如果歷史學者專心致志一層一層地剝開洋葱，去尋找想像中的本質內核的話，那麼他會發現除了剝下來的一堆東西和刺痛的雙眼外，甚麼也沒有找到。歷史文本的寫作或許並不代表歷史的真實。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弔詭。把故事撕破了給人看，這本身就需要膽量和勇氣去直面一切。

從某種角度上講，歷史是一種詮釋學。當然社會學、哲學、文學……哪一門社會科學不是詮釋學，只不過詮釋了不同的對象與範疇。社會學詮釋了人類的社會行為，哲學詮釋了介於生死之間人的靈悟……。在中國文化裏，「歷史」這個詞本身就帶有沉重的意味，但它的沉重所在，就是思考的耗勞。

頗為細緻的考察，折射出宏大的歷史場域。一部成功的學術著作，必然是結合了揭示人類普遍性的「博」和具有獨特對象、視角的「精」，套用一句話，叫做「主題是世界的，對象是民族的」。差異性的選材下，蘊含着人類普世的通感，讓讀者「享受」詮釋的魅力，體悟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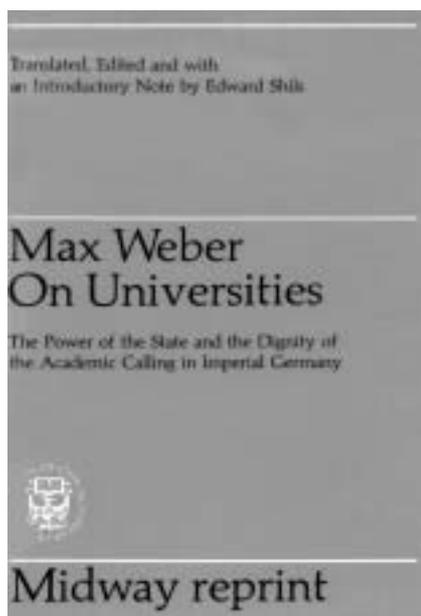
從某種角度上講，歷史是一種詮釋學。當然社會學、哲學、文學……哪一門社會科學不是詮釋學，只不過詮釋了不同的對象與範疇。社會學詮釋了人類的社會行為，哲學詮釋了介於生死之間人的靈悟……。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然科學又何嘗不是呢？只不過是詮釋的方式、思考的範疇不同罷了。在

中國文化裏，「歷史」這個詞本身就帶有沉重的意味，但它的沉重所在，就是思考的耗勞。

「所有被歷史迷住的人們都認識到變化——它的內容、意義和動力——是歷史上最微妙的部分，……找到這些變化的施動者給社會和人類帶來了希望。」(史密斯[Bonnie Smith]:〈序言〉，載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2。)把我們吸引到史學研究上來的原因之一，或許就是我們持久的幻想——歷史人物帶來歷史的變化，我們都可以成為歷史行動者，不僅僅是被動的遵從者。

## 作為大學人的韋伯

### ● 孫傳釗



Max Weber,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韋伯論大學》(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的漢譯本不久將要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與內地讀者見面了，想必也會